

树才:接受现代生活中朴素的命运

7月10日,苏州博物馆举办“凤凰诗歌之夜”,邀请了欧阳江河、韩东、胡弦、张执浩、余秀华等中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。诗人、法语诗歌翻译家树才担纲主持,为这场诗歌活动增添了一份“国际范儿”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至今,树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“诗歌老战士”了。对诗歌,对翻译,他有着精微而深透的识见。对诗坛上争论不休的诸如“口语诗”“技艺”“介入”等问题,他的批评一针见血,入木三分。

这些年,做过外交官的树才,经常担当各种中外诗歌交流活动的组织、翻译或主持工作。他常常看到,是故交、也是论敌的诗人们,打破圈子聚在一起,朗诵各自的诗歌。在诗歌普遍缺乏现实收益、越来越小众化的时代,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般山头林立、旗帜飘扬的景象,已不再有。诗人们过着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,接受了现代生活中朴素的命运,他觉得,这样的诗人和诗歌生态,反而还是比较正常的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

扫码看访谈



诗人、翻译家树才 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刘畅 摄

1

树才,原名陈树才,浙江奉化人,四岁时母亲因病去世,父亲是小学校长,整日忙里忙外,无暇督促他读书。高考考了四次,第五次,他继续进考场,竟奇迹般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。“普通话都不会讲呢,却要从零开始学法语了。我的英语考分完全靠死记硬背,典型的高分低能。”

从浙江农村来到北京,学习压力很大,“一边学法语,一边学说普通话”,不过,眼界也一下子打开了。八十年代是诗歌风起云涌的时代,北岛、顾城、舒婷等朦胧诗人正活跃在舞台上,一大批更年轻的“校园诗人”,遍布在全国各个高校,狂飙突进式的写作热情席卷整个诗坛。

在北外,树才读到欧阳江河的长诗《悬棺》,为之震惊:“我没见过他的人,但他的诗已经传到了我们校园。”中学时期,树才就自发写过一些诗,但那不算数,来到北京,碰到这么多写诗的朋友,他才觉得真正游弋在诗歌的大海。

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诗社,树才和同学们组建了一个叫TEST(英文“尝试”之意)的文学社,音译过来就是“泰思”,并创办刊物,自任主编。文学社每年都组织诗歌朗诵活动,前来参加的大学生能把大礼堂坐满,树才也开始跟北岛、芒克、多多等朦胧诗老大哥们交往。

当时,“朦胧诗”在社会上受排斥,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们的诗“看不懂”,是“令人气闷的朦胧”,但大学生热捧他们,认为他们写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于是,年轻的大学生诗人跟着老大哥一起成长,在诗歌意识和诗学观念上,一下子甩掉了此前的桎梏,把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声音看作是最重要的诗歌任务。

他们也更在乎诗歌的技艺,意识到写诗不仅在于写什么,更在于怎么写。这跟当时国外的诗歌和理论被迅速广泛地介绍到国内有关。

树才学习法语,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,从大二开始,他很偶然地接触到了法国现代诗人彼埃尔·勒韦尔迪的作品。树才沉浸在艰难的阅读中,好在勒韦尔迪的诗语言简单,但意味很深。这种阅读原文的方式帮助他理解了诗歌的现代性,也使他对于一个现代诗人写作和生活之间的那种悲怆关系,领悟得比同代人要更早一些。

“时代的浪漫和激情,让诗人们认为写诗可以是一种职业,可以一夜之间成名。当然这是一个错觉。现代诗人是不能依靠诗歌谋得生活的。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,诗人不是一种职业,而是一种内在身份,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。”有了这一番“觉悟”,树才相信,还是得学好法语,没准是他今后生活的依托。

2

虽然一直写诗、译诗,大学毕业后,树才并没有选择那些跟写作接近的职业,而是去了外贸部的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,做援外工作。这样法语就派上了用场,1987年大学毕业,1988年1月,他就有机会出国了。

树才说,那个时候,口语很差,但仗着年轻,又有老翻译带着,很快就练出来了。1990年,他就被派到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当外交官。这是个西非国家,首都达喀尔在非洲最西端,很多中国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国家,但写诗的人多少还是知道一点,因为大诗人桑戈尔是这个国家的开国总统。

法国的不少诗人,同时也是杰出的外交家。像克洛代尔、佩斯,他们是大诗人,也是外交家,都做过大使。拉美诗人聂鲁达和帕斯,也有过长期的外交官生涯。

树才认为,把诗人派到国外去做外交官,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:“诗人的民族意识强,加上他们有语言天赋,而谈判又需要灵感,让诗人去做外交官,他们能把民族文

化个性中最优秀的部分带给其他民族。”

在塞内加尔,树才从外交官级别最低的“随员”做起,做到二等秘书。他总结说:“如果继续干下去的话,一等秘书、参赞、公使衔参赞,然后没准儿还会被任命为大使,那就是一种职业的外交生涯了。”但树才的性格,导致他最终回到诗歌。只有写诗这件事,奇迹般干得挺长的,一直干到今天,而且看不出有撒手不干的意思。

从1987年大学毕业,直到2000年离开外贸部,这十多年,树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非洲。在他看来,中国的援非方式是有独创性的。“别的国家给钱,我们给人物。你缺什么,我给你建什么,从楼堂馆所到水坝农田。萨马兰奇赞扬中国为非洲体育事业做了大贡献,因为我们几乎给每一个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建了体育场。这种援助特别得人心,让老百姓真正受益。”

树才本人也做过“包工头”,指挥过援科特迪瓦国家剧场的建设工程。那是一个援外项目,持续了5年,投资2亿,树才在工地管了两年半,担任中国技术组副组长,直到主体工程完成、进入装修阶段才回国,所以很多建筑上的专门术语他都会说。

这些丰富的阅历,使树才充分感受到经济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主题——这已经不再是诗歌的年代了。“经济生活的主要模式就是交换,如果你没有可以交换的资本,那你任何行业里面都是没有地位的。”

3

过了十多年奔波忙碌的“经济生活”,树才觉得,诗歌的根扎进心里,还是舍不得拔出来,也真拔不出来。于是,他决心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“诗歌是一方面,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,外交纪律太严格,让我自由散漫的天性感到不舒服。”

2000年6月,树才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。调工作之所以能成,是因为他一直在做诗歌翻译,译作大多数发表在外文所主办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上,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恩师、翻译家郭宏安先生的鼎力推荐。

进入外文所后,树才一如既往地勤勉翻译,将勒韦尔迪、夏尔·博纳富瓦、雅各泰、佩斯、阿尔托、雅姆等法国大诗人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汉语世界。为表彰他在中法两国当代诗歌交流中作出的卓越贡献,法国政府于2008年授予他“教育骑士勋章”。

树才的本职工作,是研究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和诗学,但他从来都认为,诗歌不是供“研究”的,而是供“感受”的。而感受诗歌的最好方式,就是写诗,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写诗上。

“每天写一点,译一点,评一点,阅读一会儿,冥想一会儿,发呆一会儿。”他喜欢沉浸在一种冥想的心境中,精神上感觉到一种纯净,一种集中,一种深入。“我以前的职业曾经是很忙碌的,节奏也很快,天天上下班,有一种身不由己的痛苦,我就是因为厌倦了这些收入不错的瞎忙碌,才下决心调进外文所的。”树才说。

在诗上跟他交往最多的是诗人莫非和车前子。“车前子是我接触到的诗人中心性最自由的。他好玩,也好玩,一玩就想玩痛快,不玩痛快就磨蹭着不回家。他好像什么都懂,因为他什么都不怵。”

1999年,诗坛爆发了著名的“盘峰论争”,在尖锐对立的“知识分子写作”和“民间写作”之外,树才和车前子、莫非一起,提出了“第三条道路写作”这个诗歌理念。树才说,他的意图非常简单,旨在消解和超越“民间写作”和“知识分子写作”的刻意对立。这种对立企图将诗歌“江山”一分为二,而他个人非常厌恶这种二元对立的作法。

他写了一篇发言稿《第三条道路》,副标题是“兼论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”。他认为,一个诗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,必须有“单独探索”的勇气。这份勇气到哪儿去找?到自己那里。因为只有有在“自我”那里,才存在生命的可能性,才存在诗歌乃至一切艺术创造的可能性。

直到今天,树才依然想强调的一点:“第三条道路”——决不是他一个人或某些人的道路,而是每一个诗人潜在的、该走的路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论争,树才认为,那是因为世纪末整个社会有一种急迫的回顾过去、总结现在、展望未来的心态。“中国写作有一个文学史焦虑,谁都希望自己

在文学史的坐标轴上有一个显赫的位置。在那个背景下,发生了两种写作立场的争论。”

他又进一步指出:“80年代是理想的、抒情的年代,海子之死为它画上了句号。90年代以后,整个社会生活的标尺变了,社会的物质倾向、世俗倾向,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。在这样的时代,诗人艰于喘息,难以自持,因为写诗的人常常比不写诗的人更奢望成功。”

4

说起如今的“诗歌江湖”,树才觉得,虽然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山头林立、旗帜飘扬,口号众多,但总体来说,诗人们接受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。持久的语言探索,精神上的自我认知,回归潜心创作的正途,这样的生态或许更加正常。不过,对逝去生活的怀念,也反向地映照出“现实生活中诗性和诗意的欠缺”。

树才接受作为60后一代诗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朴素的命运,而不是朦胧诗人那种炫目的命运,因为那个时代需要他们的“愤怒”和“反思”的声音,需要他们“集体出场”。“我认为,这几年像余秀华这样的炫目出场,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夸张,也给她自己带来压力。好在,她自己实在是倔强不屈,还机智幽默,她凭诗歌实力顶住了这种压力。”树才说。

这些年,树才经常担当国际诗歌交流活动的组织、筹备和翻译工作,以诗歌活动家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场合。他的体会是,中外诗人进行交流,一定要保证外语力量,否则只好吃喝玩乐一通,然后散伙。

他认为,国际性的诗会在中国会越来越火。这是一种趋势,因为中国当代诗歌这四十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,整体上仍保持了创作活力,而中国的巨大变化也对外国诗人产生一种吸引。“你和我今天还能这样谈论诗歌,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媒体还在关注,说明诗人还能触动社会神经。法国诗人现在很难发出声音,他们得不到主流媒体的关注,无法触动社会神经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
据他观察,法、英、德这些欧洲富裕国家的诗人,已经被经济和市场规则彻底“边缘化”,这些国家的诗歌接受,从某种角度讲还不如中国,主要是更缺少读者,技术化倾向更严重。

“米歇尔·德基七十多岁了,是法国目前屈指可数的重要诗人之一,但即便是他的诗集,在法国也卖不动。他说法国最受尊敬的当代诗人应该是伊夫·博纳富瓦,他的诗集算是卖得最好的了,才印二千册。我感觉,诗歌的境况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差不多的,诗人面临的写作困难也很接近,这也许是全球化引发的另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向;中国诗歌本来就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之内,所以我们中国诗人实在没必要再跟这个‘接轨’那个‘接轨’。立足于汉语现实,潜心以求,听见自己的内心声音,写好自己的汉语诗歌,这才是根本。”树才说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树才 诗人、翻译家。法国政府“教育骑士”勋章获得者。1965年生于浙江奉化,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,1990至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,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著有诗集《单独者》《节奏练习》《春天没有方向》《去来》等,译著有《勒韦尔迪诗选》《夏尔诗选》《博纳富瓦诗选》等。